



王贵宸 陆学艺 主编

农村经济典型调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F327.524

1

3

012 28/21

农村经济典型调查

——陵县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主 编：王贵宸 陆学艺

副主编：张庆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9

B

767382

参加编写人员：王贵宸 张庆忠 张 军
王华民 樊 平 佟绍伟
尹晓青 王学东

农村经济典型调查
——陵县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王贵宸 陆学艺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牛栏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9.75印张 219千字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0050-073-X/F·7 定价：3.40 元

序 言

陵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研究基地是1983年10月确定的。陆学艺同志是这个调查研究基地的负责人。1985~1987年，陆学艺同志担任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我们曾先后派出四批计20余人的科研人员到陵县长期蹲点或作专题性考察。1986年春以前，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调查提纲和编写《陵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详细大纲，并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科研计划。接着，派出调查组进行专题调查，先后参加的有王贵宸、张庆忠、张军、王化民、樊平、佟绍伟、尹晓青、王学东等同志。1986年7月，在王贵宸、陆学艺、张庆忠的主持下，具体讨论了编写提纲，开始编写工作。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张庆忠、张军、王化民、樊平、佟绍伟、尹晓青、王学东等同志。经过三个多月的编写和调查修改。最后定稿为《新中国农村的典型剖析——陵县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农村经济典型调查——陵县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共分为三篇五个部分：

第一编，历史的回顾。包括五章：第一章：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时期；第二章，人民公社化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曲折时期；第四章，农村体制改革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第五章，陵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这一编，前四章写的都是历史，写作时

力求反映陵县农村经济的本来面目。第五章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则试图从陵县的具体实际出发，引出若干规律性的结论来，是理论概括部分。

第二编，陵县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这一编，首先对陵县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略的评价，指出陵县农村经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七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步入了新的成长和发展阶段；接着指出陵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八大优势；分析了陵县农村经济面临着六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发展的道路仍然是艰难曲折的；提出了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展阶段的设想，根据陵县农村经济的现实情况，对今后到2000年的一些发展进行预测；最后，提出了发展对策的六点建议。这一部分，试图把对陵县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运用于实践，提出各种预测和建议。

第三编附录，选辑了建国以来的陵县农村经济的一些最主要的基本数字。这些数字，有的已经在1985年和1986年的陵县农村发展研究组编印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发表过，本书将两集综合在一起并补充了一些较新的基本数字。

对一个县的农村经济作这样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剖析，这对于我们，还是一种尝试。加上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特别是山东的各级领导和关心农村经济工作的同志批评指正。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在我们蹲点调查、总结编写过程中，陵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县委农村工作部、县统计局、县档案馆、文化馆、县委招待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自始至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在本书初稿完成之后，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对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给予了很

大的关心，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谨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是献给山东陵县广大农村经济工作者和农村的企业家的。

王贵宸

1987年10月

前 言

1983年春，当我国农村进一步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行将进入第二步改革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同志建议，要在农村建立调查研究基地县，深入农村蹲点，调查研究农村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农村改革的新经验，为中央有关领导提供准确、系统的信息，提供有关农村第二步改革决策的咨询和建议。同时，这也是使社会科学研究适应新形势，开创新局面，使理论研究工作更紧密地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发展社会科学的一项措施。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提议调查研究基地县选在山东，他亲自与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同志洽商，省委领导欣然表示欢迎。1983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选点小组，经过实地选点，决定把研究基地定在山东德州地区陵县。陵县位于黄淮海平原，原来比较穷困，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广大群众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经济上属于中等发达地区，在我国北方农村具有很大的典型性。

1983年10月，陵县农村发展研究组成立，成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情报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以及山东省社科院、德州地委、陵县县委派出的部分科研和工作人员组成，共18人。由我担

任研究组组长兼陵县县委副书记，情报研究所的孙越生同志任副组长。我们于1983年10月25日进点，受到了德州地委和陵县委的热情欢迎。在省委、地委和陵县委的支持和帮助下，研究组进点后就很顺利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开始是对县属66个部、委、局、办中的大多数部局进行了调查，随后又选择了袁桥乡和城关镇的三个不同类型的村，进行实地蹲点调查。对其中的200家农户进行了生产生活方面的详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1984年和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政治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都分别派出了一部分研究人员到陵县蹲点，对县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1985年秋，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几位年青同志还到土桥镇，对镇级机构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乡、村、户关系，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所有这些调查研究资料，经过孙越生、喻培丹、顾秀林等同志的精心加工、整理，编印成了三本《农村发展研究》，共约100多万字。另外，陵县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了《关于棉花政策的若干问题》、《县级机构和改革问题》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必须加强领导》等一批专题论文和研究报告，这些文章发表和上报后，受到了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1985年7月，我调任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从此，陵县调查研究基地挂靠到农村发展研究所，蹲点的调研人员也主要由农村发展研究所派出。1986年春，部分同志提议写一本《陵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这个意见得到了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支持，列入了当年的科研计划。夏天，农村发展研究所王贵宸所长和张庆忠同志亲自到陵县，和在陵县蹲点的同志一起，详细讨论了这一课题的调查和写作提纲，制

定了具体实施计划和步骤。在已有调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张庆忠、张军、樊平、王华民、佟绍伟、尹晓青、王学东等同志，又对陵县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大量的补充调查，经过多次集体讨论，大家分章写作，到1986年底，完成了初稿。初稿出来后，陵县县委办公室田凤梅主任等同志，详细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张庆忠、王华民等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全书作了修改，最后由王贵宸同志审定。在本书的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我因忙于协助中共德州地委筹建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工作，只是做了一些组织和协调工作。

现在，本书最后完成了，书名定为：《农村经济的典型调查——陵县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本书一方面是对解放以后陵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回顾，另一方面是对陵县农村经济未来的预测和对策建议。这些，都是我们农村发展研究所几年来在陵县调查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对于这个典型县观察的几点认识，显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陵县调查研究基地的建立，至今已有四年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有二批共32位同志到陵县长期蹲点调查研究；有100多位老干部和科研人员到陵县参观访问和作短期调查研究；有6名研究生在陵县基地调查研究撰写硕士论文；另外，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及山东大学经济系的200多位同学在他们的老师带领下，在陵县基地作过毕业实习调查。所有这些调查，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加深了我们对于陵县这个典型的认识。不足的是，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的研究人员更换过于频繁，缺少长期坚持一以贯之进行调查研究的业务骨干，这使资料的积累、系统整理、综合研究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过，在陵

县调查中，有几个项目，虽然调查人员换了，但调查本身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如前述三个村的200个农户的家计调查，从1983年开始，我们坚持隔年对这些农户作一次追踪调查，使这些资料积累起来了。无疑，这对我们认识陵县农村，认识当前农村的发展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在陵县农村的调查，是典型方法的调查，也就是解剖麻雀式的调查。这种调查方法，是我们党过去历来提倡，并取得了成功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中指出：

“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这种解剖麻雀的调查方法，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曾经屡试不爽。现在党中央提出了要开展国情调查，我认为这种蹲点调查、典型调查的方法，仍应该是国情调查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因为这种调查方法本身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农村经济典型调查——陵县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在多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这是陵县调查研究基地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前面的话是对本书写作背景的介绍。书本身还有很多缺点，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在这里，我谨向给予陵县调查研究基地和本书写作大力支持的山东省委、省府，德州地委、行署，陵县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和陵县的父老乡亲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陆学艺

1988年2月18日

目 录

序 言	(I)
前 言	(I)
第一编：历史的回顾	(1)
第一章：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时期	
(1947年~1957年)	(1)
一、解放前陵县农村的基本状况	(1)
二、土地改革运动	(5)
三、农村合作化运动	(11)
四、合作化时期陵县农村的生产力发展	(40)
五、统购统销	(48)
第二章：人民公社化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8年~1965年)	(54)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	(54)
二、暂时困难时期	(75)
三、人民公社的调整	(78)
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0)
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曲折时期	
(1966年~1976年)	(95)
一、“文革”中的陵县农村经济	(95)
二、对“文革”期间农村经济状况的评价	(110)
三、几点思考	(120)

第四章：农村体制改革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

(1978年~1985年)..... (126)

一、七年成就 (126)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及其发展 (129)

三、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139)

第五章：陵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

..... (150)

第二编：陵县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163)

一、历史的转变 (164)

二、发展的优势 (168)

三、现实的挑战 (171)

四、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展阶段的设想 (196)

五、发展对策 (199)

第三编：附 录 (216)

一、自然概况 (221)

二、土地面积和人口 (225)

三、行政区划 (229)

四、工农业总产值 (230)

五、农业 (232)

六、工业 (252)

七、能源、交通运输和邮电 (257)

八、财政金融 (260)

九、贸易 (272)

十、教育、文化、卫生和科技 (276)

十一、人民生活 (286)

十二、1986年陵县农村住户调查统计分析 (294)

第一编：历史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38年来，陵县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多年中，由于决策思想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接二连三地发动了脱离客观实际，违背人民意愿的“运动”，农村生产力一再遭受破坏。虽然中间经过调整，使农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然而，稳定发展的时间都很短暂。1979年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陵县农村经济也迅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章 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时期

(1947年~1957年)

一、解放前陵县农村的基本状况

解放前，陵县农村虽然也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地主把土地出

租给农民，靠地租剥削，不劳而食，高额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象两块巨石压在农民的肩上。广大农民只能靠自己的小块土地或租用的土地勉强维生，封建的土地关系紧紧束缚着广大农民，农民对地主存在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从表面上看，解放前陵县农村的阶级分化不是十分明显。土地集中和兼并的现象也不很严重。中农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其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48.11%，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7.83%，大牲畜、主要农具和大车分别占全县农村总数的47.89%、54.19%和58.86%，户均耕地约25亩，人均房屋1.30间。占人口总数4.95%的地主，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总面积27.24%，大牲畜、主要农具和大车分别占全县总数的7.71%、17.18%和25.71%，户均土地193亩，人均房屋2.40间。占人口总数2.79%的农民，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4.78%，大牲畜、主要农具和大车分别占全县总数的21.47%、6.37%和11.97%。生活在最底层占人口总数43.80%的贫雇农所拥有的耕地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10.35%，人均耕地1.5亩，人均房屋1间，大牲畜、主要农具和大车分别占全县总数的22.26%、21.19%和1.86%。

为什么陵县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土地兼并现象不很明显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当地的土地质量较差、盐碱地较多、产量很低。在陵县107万亩的耕地中，盐碱地将近420000亩，非盐碱地只有650000亩，而这650000亩非盐碱地中350000亩良田已被地主、富农占据。盐碱地、半盐碱地及非盐碱地中的薄田无大利可图。二是陵县每个村落基本上都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所组成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的兼并。

三是全县几乎没有依仗权势、强抢硬夺的官僚地主，加上破产农民又少，地主想购买土地也比较困难。四是由于战争的爆发影响了土地兼并。陵县大部分地区属于敌我双方的拉锯地带。抗日战争伊始，有些地主贱卖土地仓皇出逃，普通农民见地价低廉则纷纷购买土地。同时，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也使得地主不愿扩大土地规模。

虽然阶级分化不是非常明显，但农民依然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他们要把将近50%的谷物用来支付地租。当时全县地主占有耕地292236.24亩，以亩产150斤计算，总产43835436斤，其中21917718斤做为地租为地主占有。抗战期间，陵县人民还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8年期间，日本侵略者抢劫的有据可查的财物就有：大牲口3317头，粮食208700斤，现金309790元，衣物51620件，布9800尺，鸡数万只，砍树1500株等等，而人民群众的实际损失实际上是无法统计的，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曾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代替了日本侵略者的明抢明夺。国民党政府的征税包括地丁银两、漕粮米石。地方附加税包括地方巡警费、教育巡警费县武装抢械费、出差费、河工附捐税、临时军业费、国防道路特捐、汽车路附捐、分帐灾特捐、建设特捐和临时特捐等等。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农村的异常贫穷和落后。农业生产条件非常恶劣，贫苦农民缺乏必备的牲畜和农具，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其微弱，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见表一）

旧政府里没有农业技术的推广机构，农民沿袭着几千年的种植习惯，农作物品种使用了千万年，产量很低。农田的

表 1 解放前的(1947年)每单位大牲畜农具大车负担的耕种数

每头大牲畜负担耕 地数 (亩/头)	每件主要农具负担 耕地数 (亩/件)	每台大车负担耕 地数 (亩/台)
31.64	9.29	178.30

肥料投入量也非常可怜，化肥无从谈起，就连农家肥也微乎其微。到了病虫害的发生季节，仅靠人工扑打，效率很低。如果灾情严重，人们只好望而兴叹。每遇春旱，人们只能等雨种地；等雨无望，只好放弃此季，等夏雨来后，种植下一季。

贫苦的生活致使有些农民无法应付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天灾人祸把他们一步步地驱向高利贷者。高利贷者苛刻的剥削把农民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农民常常要把身家性命系在高利贷者的腰带上。

由于生产水平低，可供交换和出售的农产品很少，农民在交完地租后仅能维持自己最低生活的需要。当时可供出售的农产品只有粮食。有余粮可卖的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也有少数中农。贫苦农民多是为应急而出售一部分口粮，官方和民间都没有大的农产品的收购组织。购买粮食的多为小商小贩。他们有的把粮食贩往德州，从德州通过火车运往外地；有的则在收获季节低价买进，缺粮季节高价售出，从事粮食的投机经营。工业品进入农村主要靠集市和货郎走村串户。农户购买的主要是煤油、火柴、盐、针线等。人们穿的多为土布衣裳，一般每村都有几十台织布机，户有一台纺车。只有地主家庭的成员方能穿一些洋布衣裳。

总之，解放前，陵县农村生产极端落后，农民生活十分

贫穷，残酷的战争和高额地租几乎把人们推向死亡的边缘，1947年，陵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庄严宣告已经到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了。

二、土地改革运动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国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因此必须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陵县有些地方属于老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了团结地主、富民共同抗战，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个运动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典档回赎，即用原价赎回低价典档给地主的土地。二是要求地主减免25%的地租。三是取消高利贷和一切不合理利息。“双减”运动始于1944年人冬。到1944年底，双减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全县地主和高利贷者全部按政府规定实行“双减”。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联合了一部分地主、富农，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全民参战，加快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同时也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就必须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满足农民的强烈愿望，即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10